



聚焦文学新力量

张惠雯,女,生于1978年,祖籍河南,现居美国。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组首奖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徭役场》《水晶孩童》《在屋顶上散步》等,201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

张惠雯:重返纯真与诗意

□曹 霞

随着《水晶男孩》《垂老别》《爱》等小说的发表,张惠雯作品里丰富的叙事指向和动人的力量开始呈现出来。她写少年时代的暗恋、都市男女的爱欲、现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对精神、爱情的寓言式表达。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书写中,张惠雯以天真明媚之心带着我们重返充满纯真与诗意的年代,赋予其不被消磨的洁净和激情,并将之升华为一种持久饱满的精神力量。

纯真的质询

张惠雯的多篇小说都提到了“纯真”这个词,这一气质在我们的快捷时代几近绝迹。只有当写作主体将自己朝着过去“反向”推回,沉浸于久远而缓慢的回忆中时,才能建构起关于“纯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长篇小说《迷途》视为一部“纯真之书”。小说主体是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的暗恋,他一边在遥远的岛国生活,一边视她为灵魂伴侣,惆怅倾诉,直到曲折地得知自己也一直被她爱着。比起同代人,张惠雯在读书、思考和内心上拥有更多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她那“纯真”命题能够成立,她不会让“俗”侵蚀人物的精神生活,从而使故事逾越实利主义和琐屑纠结,走向对形而上的探询。

在张惠雯那里,“纯真”多以感情状态呈现出来,在《爱》中,牧区医生艾山在酒席上受到不少人关注,他也捕捉到一个娇小的身影,心里涌动着欢喜和甘甜。这是一个未开始的“爱情故事”,可它却在主人公对于爱的精细感受和幻想中充满了天真纯美之气。《古柳官河》讲述了3对有情人的故事。乡村的人性人情之美颇有“湘西世界”的味道。在古柳、沙河和水边人家的背景下,3段单纯动人的故事衔接起关于“爱情”的古老信念,这境界便有了种暖意和明亮。对纯真爱情的“信”与“望”使张惠雯的小说流动着正大而轻盈的韵味。

在部分作品中,“纯真”不仅是爱情的修辞,还是人物超脱俗世的品性。《群盲》中就有这样一个纯真之人。他不愿意朝九晚五,想当作家。为此他不断尝试,拒绝陷入庸俗无聊的圈套。作者以纯真得近乎孤绝的方式质询“群盲”:一定要追随“他”,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成立吗?能不能听从内心的召唤,成就相对自由的“个我”?这种执著坚定的怀疑精神和不断的质询,对充斥着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当下形成了一种强有力“冒犯”。它向我们表明,真正怀着生命激情和热爱的人不是活在“肯定”中,而是活在“怀疑”和“否定”之中。

在张惠雯看来,“纯真”可以抵抗时光侵蚀,使人保有孩童的天真。然而,她也意识到这不可避免会被世俗磨损。在《蚀》中,随着民保的堕落,小莲对他的纯真爱恋一点点被蚕食了。面对这样的情感残局,张惠雯的笔触里有伤怀悲戚,但也有坚韧和坚持。《聚会》是读初中的时候,在同学的怂恿和自己的虚荣心“作祟”下来到“拐角楼”找表姐。不料却被表姐奚落,在同学面前丢尽了颜面,从此,张菊花与拐角楼“结怨”。第二次“受伤”是因为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在小庆被在“拐角楼”工作的同学姬小庆打伤,遂与拐角楼“生仇”。从此,张菊花的命运进入了人生低谷。她撕掉了不能让自己抵达“拐角楼”的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采取种种手段誓死要进入“拐角楼”,一洗自己所受的屈辱。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女孩,张菊花与“拐角楼”的斗争无异于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大战。要到拐角楼工作,成为一个吃国家饭的公家人,似乎比登天还难。在“追梦”的过程中,张菊花先是被“仙姑”骗去了3000元钱,进而被县委办周副主任奸污,一次次地受尽了人间屈辱。沉重的代价不仅没有让张菊花挤进“拐角楼”,反而让她身败名裂,被逼入人生的绝境。万念俱焚的张菊花走投无路,偷偷爬上一辆运沙的拖拉机漫无目的地出逃,不料却邂逅了自己的中学同学,认识了给她命运带来转机的包工头小强。勤劳朴实的小强后来成了性格倔强的张菊花的丈夫,并且为给张菊花“疗伤”找到了药方——他买下了破的“拐角楼”,让张菊花最终成为了它的新主人。

透过赵文辉给我们精心编织的故事不难发现,《张菊花的拐角楼》之所以感人至深,就是因为作家在这个故事中写出了以张菊花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命运,赋予人物以鲜明的时代特征。透过故事不难发现,张菊花与“拐角楼”的恩恩怨怨,不仅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恩怨,而且是一个人与这个不断变迁的时代的恩怨,更是地位、名利和人性善恶之间的战争。张菊花富有悲情色彩的“追梦”过程无疑是弱肉强食的过程,也是人性在特定的时代中被不断异化的过程。在张菊花的受伤经历中,权力、地位、金钱以及人性的贪婪、虚伪和欲望的膨胀可见一斑。赵文辉巧妙地通过“拐角楼”这个典型环境,塑造了一群特定的典型人物,从而再现了迷乱的时代生活场景,让世间善恶粉墨登场、人性美丑纤毫毕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拐角楼”由胜到衰终于破产,曾经风光一时的“拐角楼”和那些风云人物们都已日落西山,张菊花的情敌姬小强和风光一时的表姐都不可逆转地被时代淘汰和抛弃。

北村说:“好作家像一台完美的窃听器,能听到自己时代内部的对话;平庸作家只记录喧嚣。”毫无疑问,在《张菊花的拐角楼》中,赵文辉用他敏锐的笔触记录了时代内部的激烈对话和形形色色的精彩表演,让我们窥见了小人物在特定的时代“拐角”所经历的“破茧”之苦和“蝶变”之痛,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

这些充满“残缺”和“磨蚀”的故事是现实生活的常态,它们携带着当下的精神荒凉与颓败,以一种生动的、带有一代人生存印记和命运变化的经验“素描”了一个时代的肖像。张惠雯不是为了证明“纯真”会遭到损毁,而是向着人性的黑暗和深渊发出询问。她并不寻找答案,却在磨损和罪恶里铺展出人性中模糊而犹疑的地带,从粗鄙和堕落中看出人的“洁白”。

向着现实敞开

在张惠雯看来,描写现实时“经验”固然重要,但“小说作者最好还具备洞察力、感同身受的能力和想象力”。在面向现实的写作中,张惠雯有一种“敞开”的姿态。也许正是因为经历单纯,她反而能够扩展写作的边界。越是进入遥远而边缘的界域,她越能够毫无遮拦地展开虚构和叙述,越能够像“身处其中”那样把故事叙述得绵密细致、淋漓逼真。

在张惠雯的作品中,以对话为主的《垂老别》颇见功力。小说以3个夜行人展开故事,王老汉、他的弟弟和村长为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去找他的小儿子,却遭到冷漠推脱。一个坚守传统伦理却最终被亲人盘剥得一无所有,内心充满尊严、畏惧和难堪的乡村老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撇去了笼罩在亲情和爱情之上的礼仪道德,以精微贴切得近乎冷酷的叙述还原了人的本性。《路》通过孤苦无依的老妇人去看望教友小宋、将教友们凑的钱送到老郭家两段故事,细腻地铺陈出老人们在破败无望的现实生活中追求精神彼岸的心境,并把不同家庭的生存景象连接起来,呈现了“人之老境”的凄凉图景。在小说结尾,老妇人在雪地里缓慢从容地行走,心中没有阴影。一种由生存本生自发而成的坚韧结结实成为文本的底色,对“尘世之苦”的出离使小说弥漫着淡淡的诗意。

张惠雯“写实”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最具当下情境和时代变化特征的情感故事。《完美的生活》讲述了在新加坡生活的6对中国男女的爱情与婚姻生活。在复杂的男女关系和变幻莫测的组合背后,是他们共同的爱之匮乏与焦虑。《蓝色时代》写一个男孩对妈妈的同学产生的朦胧情意;《暴风雨》叙述了一对男女被困于车内的一段“婚外情”;《小角色》以日记体形式展现了一个在爱情中极其尴尬和苦痛的女性内心世界。作家以对激情与理智的深切观察、对人性和情感变迁的敏锐捕捉,讲述了一个个困惑于生存与人伦、或者在道德边界游移的爱情故事,层层崭露出人性里最黑暗本真的部分。

张惠雯笔下有这样一类女性,她们或生机勃勃或安静素淡,对男人和世界的认知是天真而茫然的。比如《年轻的妻子》中那个饱满害羞却行踪不定的小妻子,《书亭》中那个在书亭里度过青春只能对窗外世界抱以幻想的女孩。她们在婚姻和爱中的耽溺、想象与犹疑,展现出女性在混乱荒芜的境遇中对“完满”的坚守,即便生活最终被证明为破败不堪,但坚守本身敞开了面向一切的可能性。

张惠雯的现实题材很“陈旧”,但她通过对现实细致而生动的处理,对世俗人物不断尝试与冒险的审美判断,生成了既属于写作者个体、也属于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经验和生活经历

的共同记忆。

寓言化写作

作为一种古老的写作方式,寓言以寓理的深广性和普遍性成为重要的文体。当我们认为“70后”缺乏寓言思想与精神含量时,张惠雯却从这里出发,坚持不懈地探索小说中抽象化与哲理化的表达。

在张惠雯那里,寓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探索复杂人性与纯洁自由精神的关系。《水晶男孩》中那个美丽透明的水晶男孩让污秽中的世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他自己也遭到了世俗力量的不断磨损。《徭役场》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受到规训和奴役,难以反抗,终被规训。这两篇小说既可以理解为“人性恶”和“奴性”的寓言,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寓言。

《极速列车》是一个关于高速发展社会的寓言。在世界上最快的列车上,“无知者”沉浸在科技的刺激之中,瓦特及助理爱因斯坦不停地做试验,以让其更高速地前进。这篇小说涉及科技、速度、教育、虚幻与真实等多个主题,它们共同构成了高速发展的危机预言,以看似荒谬滑稽的设想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下情境中人的生存状况。

《岛》和《岛上的苏珊娜》更像是从神话和人类生活中截取的片段,人物的对话远离烟火气,间以大量的讨论和思索以及充满诗意的描写。《岛》设想在一座岛上,一对男女过着亚当夏娃的“乐园”生活。一艘大船的到来打破了他们长久的宁静,让他们对彼此充满了嫉妒和恐惧。而《岛上的苏珊娜》恰好和《岛》形成“逆向”推演:一个由“信”走向“不信”,一个由“疑”走向“交融”。“我”和苏珊娜展开了关于男人和女人、灵魂和肉体的对话。他们意见相左,却不妨碍彼此讲述古怪而没有意义的梦,直到“在荒凉的岛上,她的眼睛是唯一的灯”。这两篇小说没有鲜活的现实生活,氤氲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些片段、呓语和文不对题的对话。它们都可以视为对两性关系中“忠贞”问题的寓言性探讨,在折射出以爱情为象征的精神世界可能出现的空洞时,也在盘诘着“爱情为何”、“生命为何”等终极命题。

《安娜和我》则以纯净悠扬的韵味揭示了如下命题:只要坚持,安详宁静的精神可以一生相伴。安娜是一头大象,贫穷的“我”善待她,视她为灵魂的伴侣。这篇小说具有诗一般纯粹的精神质地,它的寓言力量来自于“安娜”,她不仅仅是一头大象,更寓意着每个人生命中如影随形的精神物象。随着个体的成长与见证,它们最终会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构成相互映现的瑰丽镜像。

张惠雯的小说里有着浓郁的“诗意”:洁净、空灵、轻逸,囿于尘世又超拔于此,有直袭心灵的精神物象,也有潜意识世界的丰富和深邃。在被关于人性的忧虑和未来的宿命感所笼罩时,“我”也在不懈地寻找具有个性、艺术性又不乏公共认知的精神表达,由此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诗性沉思录。一切留恋着诗性和纯真的人,一切愿意在文学中寻找心灵自由与呼应的人,都可以在她那里感受到精神世界的优美和深邃。

■创作谈

9月的某个夜晚,我和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走在北京的街头。迎面走来一群说个不停的西方人,这位朋友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西方人过于吵闹,他们太爱表达,不懂得沉默的含义、沉默的美。的确,在社交生活中,美国人把“害羞”、“内向”看成一种缺陷,甚至当成有待治疗的心理疾病。掩藏起来的美学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会走向另一端:极简。极简有它的启示意义,但我并非极简的崇拜者,这就像一个人喜欢匀称的身段却未必追求骨感。

无论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是契诃夫那些不朽的短篇佳作,其特点之一是纤秾合度,把最应表达的表达出来,把应掩饰的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因此,它们才具有异常耐读的品质。在这些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会从句子里的蛛丝马迹、巧妙的隐喻和映照中发现未写出来的内容,它们就像绘画里的阴影和留白,与光亮的部分一起决定着作品的质感、深度和氛围。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做另一种表达。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所说的:“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幅印象派绘画。它应当是真实的迸发。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如果语言表达追求的是“意尽”,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并不服从这个原则。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短篇小说的作者除了化炼词句,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使小说呈现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乏味的危险。

契诃夫曾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声来。”大概他早已发现,“忍住不说”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无比困难。无论在他人小说里,还是在自己的小说里,我多少次发现作者说得过多?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多少次要和“说出来”、“说清楚”做一番严酷的斗争?大多数时候,我失败了,我把应该删去的句子重新加到小说里去,唯恐人们体会不到我的用意,结果,理应沉默的地带变得喧嚣,小说的美感被破坏了,矜持的艺术法则遭到破坏……我觉得我是在“删除”、“恢复”、“再删除”、“再恢复”中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儿忍耐的技能,尽管时至今日,我有时仍会把一些理应删除的废话当珍宝。

日常生活中的事与事、人在平静生活表面之下内心的情感和曲折更吸引我的注意,它们对我来说更富于诗意,也更易唤醒我的联想力。有时,别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或者一个小细节,我会听得着迷,如果他们告诉我一件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我反倒不知所措。我想我只能当一个印象派的小说家,宏幅巨制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我宁愿让精练的词语、细节和氛围说话,以便使人物突出,而非情节突出。我的短篇小说常常缺乏情节,它更像是个随意截取的、现实生活与心灵生活交织的片段,对我来说,这个片段式的情节是一种真实,或者说,它是表达人的真实的一个手段。

我喜爱的人物往往不怎么外向、健谈,在一个懂得适时沉默的人身上,我能发现更多的美和故事性。在今天的社会,露骨的展示、大声的叫嚷已成为吸引注意的普遍捷径,而我仍固执地要求我的人物为了美感而保持基本的矜持,这实在是个不顺潮流的嗜好。可每当要求小说家为大众口味的改变而“改善”自身的呼声响起,我反而更顽固地想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影响读者的思维与感受,那么至少,别让读者轻易地改变了你。

悲”、“宠辱不惊”的心境。或许,过去都是历史,历史永远不会给作者留下创伤和仇恨,而带给他的只有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心境。

《难忘岁月》的文字是个性化的,带着深沉的感情。从作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人公是一位自信、自强、自立的人。他富于进取心,一生都在拼搏与奋斗中度过。在回忆父母和发妻时,作者满含深情。此外,偶尔能读到作者的睿智、幽默之语,这些都需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思索作为积淀。

作品中有许多鲜活生动的情节,如作者少年时为了苦读书,半夜躲在伙房里看书被当作小偷抓起来。他自小持家的经历、80年代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得了肺结核死里逃生的传奇、前往矿难现场路上遭遇车祸险些丧命等等,都精彩可读。还有许多细节,充分塑造了书中人物的鲜活形象:如刚进城时不会用自来水,朝一个方向拧水龙头结果没关上水便“落荒而逃”,母亲第一次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感到无比的神奇和惊骇,以后总称其为“戏匣子”,饥荒时期姑妈每次来家送点粮食总要顺手拿走点东西……

《难忘岁月》,难忘人生。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段有价值的独特人生;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可以让人思考和启迪的人生。

■评论

写给子孙后代的一本传记

□李朝全

郭振西自1997年起酝酿创作回忆录式的自传《难忘岁月》,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总结、反思和省察。对于作者自己,这是过去岁月的追忆和记录,是此生不平凡的真实记述。对于亲朋好友,是一种亲情、友情的书证和安慰。而对于普通读者或者子孙后代,这部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父辈、祖辈的生活及生平经历,更好地树立自信自强之心,去做一个正直、真诚、进取、有为的人。

谱传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某种层面上看,大家都注意到了社会风气消极堕落的一面,通过修撰谱传,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以自己的人生来言传身教、教诲后代,或许可谓是一种家风的传承,是传统道德借助家族的血脉进行不断的传递和延续。《难忘岁月》便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郭振西亲身经历的80余年历史,其中有不少独家、独有的历史叙述。这实际上呼应了一段时期以来口述实录的写作风潮,具有抢救历史、保留史实的意味和价值。

对于作者自己的子孙后代,它的教育价值更为明显。它不仅可以帮助子孙们了解自己父辈艰辛而不凡的人生,更可使他们从这种人生历练中汲取力量源泉。书中

有诸多的人生感悟和体会,如以诚待人、厚道处世、多做好事、宽容大度等。作者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处世之道,抒发了自己对于平凡人生的真知灼见。

郭振西经历的历史风云某种意义上成

了历史的见证与记录。他的人生经历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高

潮期,也经历过饥荒、“肃反”、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丰富的经历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历史风云。

此外,对于矿管局以及1990年后成立的中国矿业协会的历史、《中国矿产报》的发

展简史,《难忘岁月》里都有重要的记述。这些记录具有很强的认识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史志文献价值。书中作者对于我国海洋勘探历史的讲述更是相当重要的史料。譬如,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在南海的地质勘探阴差阳错地导致今日南海万丈灯火,各国争先钻井抽油惟独无我的状况的记

录;对后来在东海、黄海、渤海等处进行地

质构造勘探,修建石油钻井平台经过的描述;

对作者参与的地质矿产部门与外国的交往,参

与国际海洋法制定过程的记载等,都具有

重要的史志价值。

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难忘岁月》具有朴实的文本价值。作品的叙事是朴素的、真诚的,就像是在对朋友、对后辈讲述、

恳谈,亲切真实而不加渲染、矫饰。这种平

静的叙述看得出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

为明天留住善良

□胡银芳

出,家庭的反对、世人的评说、伦理观的冲

撞让他不堪重负,但是他坚持了下去。

《婚刺》中的另一个圣人就是程紫月。

她在不认识汤煜峰时两次给他捐献骨髓,

不求回报。她的这一做法,是因为她曾经接

受过不留姓名的好心人的帮助。为了延续

这份好心人的爱,她决心把救助别人的爱

进行到底。在知道自己孩子的班主任难为、

挑剔孩子的时候,她一次次与老师当面交